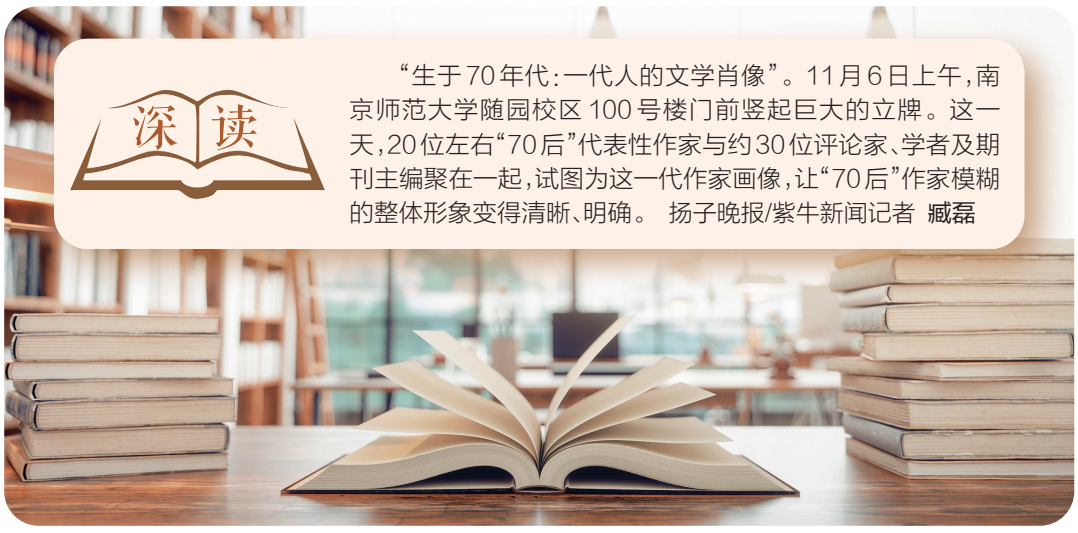
“70后”作家为何迟迟未能经典化

50位作家、学者齐聚南京,试图为这一代作家画像



深读

“生于70年代:一代人的文学肖像”。11月6日上午,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100号楼门前竖起巨大的立牌。这一天,20位左右“70后”代表性作家与约30位评论家、学者及期刊主编聚在一起,试图为这一代作家画像,让“70后”作家模糊的整体形象变得清晰、明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们依旧是‘晚熟的人’和‘迟经典化的一代’,‘70后’作家的经典化远远不够。”当日发放的会议手册上,这一句话写得相当直白。

“70后”这一文学概念,最早是在南京提出的。1996年,作家陈卫在南京创办民刊《黑蓝》,打出“70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的旗号。此后30年,这个命名从南京出发,逐渐成为文学界讨论一代写作者时绕不开的框架。

对“70后”作家的讨论已不止一次。早在2014年,就曾举办过“中国‘70后’作家创作研讨会”;2017年,“‘70后’作家大系”42卷丛书出版;2024年,也曾有“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力军——‘70后’作家经典化讨论”活动举办。但对“70后”这一代作家作品为何迟迟没有经典化,依然还有许多可以研讨的地方。

“70后”这一代作家,少年时恰逢改革开放,青年时期撞上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在2000年左右又遭逢互联网大发展,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

成长经历塑造了这一代人的写作底色,也塑造了他们在文坛中的位置,夹在“50后”“60后”与“80后”之间。评论家韩春燕用“老大、老二和老三”作比:“老大和老三都是被看到的,老二,付出更多,做得很多,然后不被看到。”

在讨论这一代作家时,“夹缝”一词频频被提及。有学者认为,这一代作家,不像“50后”“60后”作家,有那种大的时局变化的经历,刚出道时间不长,紧接着就是网络盛行,媒体对写作的关注迅速转移到了“80后”的身上。这种尴尬,在具体的作品发表场景中表现为一种取舍的犹豫。在此次由南师大、凤凰传媒&译林出版社和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的研讨会上,有期刊主编表示,考虑头条时,“如果同样有一个‘60后’在这个盘子里面,有一个‘50后’更不必说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毫不犹豫,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这样一个作品和作家”。奖项和榜单的考虑也类似,“为了多样性、丰富性,年龄代际有区别、有差异,我们放一个‘70后’吧”。

评论家何同彬提到一个更量化的参照,五年前某次评选的“长篇小说二十年二十部”榜单中,“一部‘70后’小说家的长篇都没有”。

二

作为代际命名的“70后”是一个整体,但落到每一个作家身上,面貌又各不相同。鲁敏在发言中说,从乡村叙事到城市书写,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化表达,从叙事结构到语言探索,“我们其实跟任何一代作家一样,可以以年龄的方式来分代,但是每一个作家本身还是在时代和水流当中呈现出每一条鱼独有的样貌和纹路”。

张清华在主编《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时,也“充分感受到他们的才华、个性、文字,也的的确确知道,他们是无法归拢的。除了一个身份共同体之外,他们之间可能更多的是个体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徐则臣的“悲观的理想主义”,是张楚写小县城日常的荒诞冲动,也是哲贵的“反谱系写作”。

但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崔庆蕾认为,“70后”与前代作家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日常生活成为叙事主体。“前一代作家作品里也有日常生活,但这部分内容背后埋藏着特别大的历史。而在‘70后’一代作家里面,真正地看到一直在讲的文学是人学,人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生长出来的。”而在他们的笔下,城市书写也真正展开。“因为他们出生的年代,包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我们整个城市化展开的一个历史时段,他们的书写和城市发展具有同构性。”

这一代作家整体形象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慢慢地被看见、被认识,白烨从奖项和文学史的角度给出了最硬的一组事实。他说:“在‘70后’作家中,自魏微在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开始,每一届都有‘70后’,而且不断增多。”他提到刚评完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70后’包含8名之多,几近获奖者的1/3”。他还举了两个标志性事件:“徐则臣以《北上》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乔叶以《宝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白烨的结论是:“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获奖作者的作品都是当代文学的优秀力作,由此也体现了‘70后’作家的创新能力和创作活力。”

那么,作为整体而言,“70后”作家为何会“经典化迟滞”?这个问题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被集中讨论。批评家多从外部结构入手,作家则更多转向自我诊断。

方岩从文学史教育和评价制度角度切入,认为文学史叙述基本截至“70后”的学徒期,大学教育反复涂抹“50后”“60后”作家,而评价制度又走向“青年崇拜”,“‘70后’再次被卡在了中间”。李松睿从读者端补充:“‘70后’作家更多地依靠个人生活经验进行写作。但是,新一代的读者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多来自间接的媒介,‘70后’作家写作在面对这群新读者时,先天就不占优势。这可能也是造成经典化不够的原因。”

有几位学者指向了批评界。他们认为,“经典化程度不高,问题非常复杂,一是当代批评环境很差,大家都是‘好好先生’,没有人敢于提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70后’经典化程度;经典化程度不高,又削弱了‘70后’作家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不好的循环。”沈杏培在归纳“结构性不足”时,也把“批判同行的收敛”列为其中一条。

作家们的自我审视也是不留情面。有作家逐条列出“70后”作家“被诟病”的倾向,比如同质化,“因为互联网的便捷让我们经验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书写也就具有重复感和闭门造车感”;还有作家反观自身:“你说写作三十几年,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也没有把这个稳定的价值体系输送到我的作品里面。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写三十年也好,五十年也好,可能到最后,你这个作品是趴在那里的,你这个作家可能也是趴在那里的。”他说想到这个问题时“一身冷汗”。

三

提及“70后”这一代作家,评论家刘大先有一种“非常悲怆的感觉”:“‘70后’这批作家,可能是书面文学或者印刷文化时代的最后一代作家了。此后不是说作家没有了,而是说他们会成为类似于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那种手艺人。”“如果我要给‘70后’这些作家有一个命名,我想可能就是具身性写作的最后一代人。个人身体的经验,肉体的经验,欲望、情绪,这些真正意义上来自人,作为肉身性人的经验,我觉得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而更年轻的写作者,“肉身经验已经缺失掉原来老的乡土中国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何同彬的说法与刘大先接近,他将“70后”视为最后一代作家或伟大文学时代的守夜人。

并不只有沮丧。作家石一枫说,“经典化,说到底是读者检验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检验的结果。”他不认同“悲情”叙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悲情的。十年前老说夹缝里的一代,说起来我们好像香肠一样的。”他认为,“我们认认真真把这件事干好就完事了。”

计文君也明确拒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定位:“我不觉得我们是具身写作的最后一代,我也不希望自己去做什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非遗就意味着它是属于过去的……我要我的写作永远和我的当下、未来和我自身所在的时代的文化,发生非常确切的关系。”她主张回到叙事本身:“重新去锤炼语言,重新审视结构,重新回答小说是什么和好小说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面对我们的历史处境,如何承担我们的文学命运,如何去破局?我觉得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写’,两个字就是‘坚持’,没有别的办法。”付秀莹说。

《沸城》:写下上世纪九十年代珍贵的市井烟火



日前,建筑设计师苏丹的“城市三部曲”收官之作《沸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此前,苏丹出版的《闹城》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在太原的青春生活,《黑白之城》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的求学往事,而《沸城》则是落笔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

故事以作者在光华路时期的中央工艺美院求学为起点,通过私人记忆回望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点滴,以幽默不失锋芒的笔触记录大时代下小人物在北京的众生相。在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迪斯科、工体甲A球赛、流行音乐演唱会,令人血脉偾张;BP机、大哥大、二哥大,打开现代通信世界的大门;不断突破的城市天际线与热火朝天的工程项目招标,使人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向往。书中有数不清的奇妙故事和小人物,校园里晃晃荡荡的小混混、胸怀总经理梦想的小职员……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烟火展现得淋漓尽致,更将飞速更迭的时代下普通人命运重塑紧紧相连。

《沸城》延续了《闹城》《黑白之城》一脉相承的叙事结构:将个体生命历程、社区市井日常与一座城市雄浑的历史变奏融为一体,由微观生活透视时代脉动。以亲历者视角打通了个人叙事与宏大时代脉络,让私人记忆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相互印证。正如杨澜所言,这部作品“以平凡人的视角,记录了那段独一无二的岁月”,留存下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最珍贵的人间底色与市井烟火气。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赠书福利

扬子晚报B座西窗将为读者赠送一本《沸城》,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B座西窗公众号留言,留言点赞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请及时截图私信小编)。

活动截至2026年11月9日中午12时,期待您的精彩留言!

上期赠书结果:网友“寻一个出口”获《三人行》一套。